

清顺治《汉中府志》纂修考*

——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书写

王浩远

提要：清顺治十三年（1656），汉中府知府冯达道主持纂修了清代第一部《汉中府志》。冯达道直接利用万历《汉中府志》旧志雕版重新刊印新志，在顺治《汉中府志》中系统保留万历旧志文献；又采取替换、增补方式将明末清初汉中史事融入志书之中。冯达道则以旁观者的视角对明清之际的汉中社会变迁、旧志编纂得失进行评论分析。全面考察顺治《汉中府志》的纂修过程与文献价值，对于后人理解明清易代之际地方志的纂修方式与书写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顺治《汉中府志》 冯达道 万历《汉中府志》

汉中地处秦岭、巴山之间，地理位置险要，历史文化悠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①。汉中于明清两朝曾数度纂修府志，时至今日仍有明嘉靖《汉中府志》，清顺治《汉中府志》、康熙《汉南郡志》、嘉庆《汉南续修郡志》4部府志存世。就目前所见，学界对汉中府旧志的研究成果尚不丰硕，仅见王浩远《明嘉靖〈汉中府志〉编纂考》[《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孙启祥《清康熙〈汉南郡志〉的编纂及其特色》[《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两篇论文。这一研究现状与汉中府旧志多为稀见孤本密切相关，专业学者也难以一睹旧志面貌，系统研究更无从谈起。2016年，清顺治《汉中府志》收入《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为学界系统了解该志全貌提供了便利。现将顺治《汉中府志》的编纂背景、纂修办法、文献价值考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 纂修人冯达道之生平

顺治《汉中府志》由汉中府知府冯达道纂修成书。冯达道，字惇五，号鹭蓉，明朝末年生于常州府武进县。^②青年时入常州府学，明崇祯元年（1628）入选岁贡。清兵南下占领江南之后，冯达道以常州府学生身份参加清廷组织的乡试，并于清顺治三年（1646）得中举人^③；顺治四年，冯达道参加会试，再度告捷，高中进士^④，位列第二甲第三十九名。^⑤此后冯达道被任

* 本文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南明清方志研究”（项目编号：2017N002）阶段性成果。

①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56《陕西五》，中华书局，2005年，第2660页。

② 参见邹祜谟、王士禛辑：《倚声初集》卷2《爵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729册，第202页。

③ 参见于琨修，陈玉瑾纂：康熙《常州府志》卷16《岁荐》，“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册，第319页。

④ 参见康熙《常州府志》卷17《甲科》，第363页。

⑤ 参见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063页。

命为淮安清江浦常盈仓户部分司主事，由此走上仕途。^① 康熙《江南通志》冯达道传记载：“冯达道，字惇五。顺治丁亥（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岁入覲，诏覲臣奏地方利弊，江右藩司以袁、瑞二府浮粮对。疏下部议，同官咸难之，达道力争，得报可。”^②

或许是冯达道在户部主事任上的优异表现获得上级青睐，顺治十三年（1656），冯达道被命出任汉中府知府。^③ 彼时的汉中正是用武之地，平西王吴三桂、定西侯唐通等人率领大军驻扎于此，奉清廷之命围剿蜀地抗清武装。冯达道“出守汉中，时汉南半为军营地”^④，为军队调运筹措军饷、安抚本地百姓、调和军民矛盾成为冯达道的主要工作。小小的汉中府知府与领军王侯地位悬殊不啻天壤之别，冯达道作为地方官员时常受到来自军方的压力。康熙《江南通志》在冯达道传记中记载其在汉中任职时的一桩轶事：“有吏索营债者，向守追捕。达道厉声叱曰：‘某为朝廷官，为若辈追逮耶！’谢事告去。帅府随缚前吏，挞之。始出视事。”^⑤ 汉中驻军中有官吏放高利贷，无法收回，却向冯达道求助，要求官府派人替他追捕欠贷者。冯氏愤然以辞职相告，不问政事。最终以帅府痛挞小吏、谢过了事，冯达道才再度出面办理公务。由此可见冯达道刚直不阿的品格，亦可见其日常工作中勉力维持地方行政运转的复杂局面。正是在这一局面下，冯达道完成《汉中府志》纂修工作。顺治十七年，冯达道升任河东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⑥ 负责山陕两省盐池的管理及山、陕、豫三省食盐营销事宜。至康熙二年（1663），冯达道自河东盐运使离任之后，未再担任官职。通观冯达道从政履历，户部主事、河东盐运使都是以处理经济事务见长的官职，汉中府知府虽是地方行政长官，但彼时汉中为用武之地，经济事务也占据他绝大多数时间与精力。冯达道既勇于任事，纂修《汉中府志》的过程，也体现冯达道讲求时效的施政原则。

二 旧志雕版再度利用

顺治《汉中府志》纂修完成之后，冯达道“抚卷喟叹，叹世事之变”^⑦，撰写《重修汉中志

① 按：马麟修，杜琳重修，李如枚等续修《续纂淮关统志》卷8《题名》，附录“仓厂分司”职官题名，分列“常盈仓户部分司”与“清江厂工部分司”二部分司主事题名、清江厂工部分司题名载：“冯达道，长洲人”。题名之后按语云：“仓厂分隶户、工二部，向来各有专员管理，与淮安钞关并峙。自康熙九年以十里三关，题准裁并淮关征收，而当时司榷之人，苟有一善足录，亦今日淮关之程式也。其奈历年久远，淹没无闻，不独政绩失传，即其年分、爵里亦多舛讹，莫可考订。今只就《淮安府志》中所载姓名名录之，以俟考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史部，第273册，第825页）可知此题名讹误较多，冯达道分司、籍贯皆误，但亦可知冯氏当任常盈仓户部分司主事一职，此职与其覲京奏对江西袁、瑞二州浮粮事相符。

② 于成龙等修，张九徵等撰：康熙《江南通志》卷44《人物二·常州府·皇清》，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江南通志局刻本。

③ 参见冯达道纂修：顺治《汉中府志》卷4《官守志·官师·知府》，“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第144册，第363页。

④ 孙琬等修，李兆洛等纂：道光《武进阳湖县合志》卷24《人物志三·宦绩传》，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

⑤ 康熙《江南通志》卷44《人物二·常州府·皇清》。

⑥ 参见苏昌臣辑：《河东盐政汇纂》卷4《官师·河东都转运盐使题名记》，《续修四库全书》，第839册，第598页。

⑦ 冯达道：《重修汉中志序》，冯达道纂修：顺治《汉中府志》卷首。“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46页。

序》列于志书卷首。该序作于“顺治岁次丙申汉台奠饮之日”^①，“顺治丙申”即顺治十三年，“汉台”为汉中府署所在地，“奠饮之日”即指九月九日重阳节，该节有佩茱萸、饮菊花酒之风俗。由此日期判断，冯达道重修《汉中府志》成书于顺治十三年九月九日之前。前文已经述及，冯达道出任汉中府知府也是在顺治十三年，虽然不清楚冯氏到任的具体时间，但顺治《汉中府志》纂修成书仅在数月之间，应是确凿无疑的。如何在短短数月之间，如此神速地完成重修《汉中府志》的工作，这其中必然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

地方志书的纂修一般都会沿袭、利用前代旧志文献，在旧志内容基础上加以增补、删节，形成定本之后，重新雕版刊印新志。冯达道亦在《重修汉中志序》中回顾了寻找明代旧志的经过：“予抵兴元，首问主藏吏，漫应曰：‘无有。’索之再三，以镌版数片呈，积尘寸计，点画不可辩[辨]。盖自万历癸卯，以至于今，垂及六十年，所不付诸羸烬者，幸也。”^②冯达道再三催问，吏员虽未找到旧志，却在库房中找到了不少旧志雕版。经冯达道辨认，发现这是一批“万历癸卯”《汉中府志》旧雕版。万历癸卯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距顺治十三年已过去五十三年之久，故而冯达道说“垂及六十年”，这批经过明末清初战乱劫难的旧志雕版仍能保存下来，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不过冯达道对这些旧志雕版评价并不高：先说“镌版数片”，这是说雕版数量极少；又说“积尘寸计，点画不可辩[辨]”，这是说雕版保存不善。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这些刊刻万历《汉中府志》的旧志雕版几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但冯达道话锋一转，又说“所不付诸羸烬者，幸也”，反而说明这批雕版颇有价值。这确实是非常矛盾的言辞，不过，细细想来，如果旧志雕版没有任何价值，冯达道又何必去提及此事呢？

其实，府库中保存的万历《汉中府志》雕版数量并不像冯达道说得那么少，恰恰相反，雕版数量不但非常庞大，甚至于将整部万历《汉中府志》保存下来。这也就为冯达道编纂顺治《汉中府志》提供极大便利，冯氏不但几乎全盘接收旧志文献，甚至于直接利用万历《汉中府志》旧志雕版重新刊印新志。这种情况在明清地方志中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冯达道能够在短期内“冗中抽暇，谋成此书”^③，万历旧志雕版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既省去重新刊刻新志之劳，又节约大量时间与经费，也正是由于冯氏对旧志雕版的再度使用，使得顺治《汉中府志》的纂修周期大大缩短。

我们只需稍加留意顺治《汉中府志》内文的字体差异，就会发现冯达道直接利用旧志雕版重新刊印新志的证据。据顺治《汉中府志》书叶考察，万历《汉中府志》雕版字体接近于标准嘉靖本字体，而清代替换增补书叶则使用明万历以后流行的方体字，二者字体差异较大，极易辨认。顺治《汉中府志》全书6卷，卷1《舆地志》共49叶，今藏本缺第24叶，存48叶；其中使用旧志雕版重印37叶，替换增刻11叶。卷2《建置志》共59叶，其中除汉中府所辖府州县图占10叶篇幅，无法确定刻本情况之外；使用旧志雕版重印26叶，替换增刻23叶。卷3《食货志》共37叶，今藏本缺第20叶，存36叶；其中使用旧志雕版15叶，替换增刻21叶。卷4《官守志》共94叶，今藏本缺第23叶，存93叶；其中使用旧志雕版重印50叶，替换增刻43叶。卷5《人物志》共60叶，其中使用旧志雕版重印叶38叶，替换增刻22叶。卷6《艺文志》共167叶，今藏本缺第18、29叶，存165叶；其中使用旧志雕版重印139叶，替换增刻24叶，后人抄补2叶。

① 冯达道：《重修汉中志序》，“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50页。

② 冯达道：《重修汉中志序》，“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43页。

③ 冯达道：《重修汉中志序》，“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46页。

由此可知, 顺治《汉中府志》直接使用旧志雕版重印的叶数极多, 几乎占全志总叶数的七成; 冯达道重刻书叶仅占全书总叶数的三成, 这其中又有不少书叶是由于旧志雕版损毁、无法使用的情况下, 不得不重新翻刻以替换旧志书叶, 并非新增内容。正是因为冯达道在纂修顺治《汉中府志》的过程中, 大量使用明代旧志雕版再行重印, 使得万历《汉中府志》名亡而实存。

冯达道使用明代旧志雕版重印新志的证据, 不但见于版式的明显差异, 亦屡见于顺治《汉中府志》各卷文字。如卷1《輿地志·沿革》分述汉中府所辖各州县沿革, 均用明万历雕版重印书叶, 并于“汉中府沿革”文末补“清兴如旧”4字^①, “褒城县沿革”“宁羌州沿革”文末则补“清朝因之”4字^②, “凤县沿革”补“清朝如故”4字。^③ 或对书叶内容进行挖改, 如“南郑县沿革”载: “隋复为南郑, 唐宋元明及本朝皆因之”^④, 自“本朝”二字另起一行, “明”“及”二字均为重新挖补添加, 相同情况亦见城固县、洋县沿革。卷2《建置志·城池》记载汉中府城及所辖州县城墙修补情况, 相关记载的时间下限在“万历三十年知府崔应科议罢耕”汉中府城垣之时^⑤; 冯达道将万历旧志雕版城池沿革中“本朝”或“国朝”二字的首字磨去, “朝”字改为“明”字。

卷4《官守志·官师》载汉中府建置及职官设置情况, 在叙述元代职官设置情况之后, 下文即换行顶格书写“国朝”二字^⑥, 叙述明代设置知府、同知、通判等官员的情况, 后文又补刻明末清初事, 可知此处的“国朝”为明朝无疑, 冯达道使用旧志雕版未及挖改“国朝”二字; 同卷《宦迹》载明初汉中府知府费震传记, 费震“以事被谴, 朝廷知震良吏, 释之, 为牧民者劝”^⑦, “朝廷”二字换行顶格书写, 可证该叶为明刻本无疑。卷6《艺文志》诗文均为明朝之前作品, 最末一篇艺文为崔应科《新创兴明寺碑记》, 全卷均无明万历三十一年之后的诗文。

除了上述书叶版式、文字证据之外, 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为我们保存了顺治《汉中府志》使用万历旧志雕版的间接证据。《天下郡国利病书》收录一篇有关汉中水利工程的文献, 记录汉中府所辖南郑县、褒城县、城固县、洋县、西乡县、勉县、宁羌州共六县一州堰渠设施及灌溉田亩情况, 文献出处标注为《汉中府志》。明初, 汉中府领金州、宁羌州二州及南郑、褒城、城固、洋县、西乡、凤县、平利、石泉、洵阳、汉阴、白河、紫阳、勉县、略阳14县, 可谓地域广阔。至万历十一年(1583)八月, “改陕西金州为兴安州”^⑧; “万历二十三年, 改(兴安州)直隶(陕西)布政司”^⑨, 兴安州及其下辖平利、石泉、洵阳、汉阴、白河、紫阳六县不再隶于汉中府, 使得汉中府所辖州县数量大为减少。

顾炎武所见《汉中府志》只记录万历二十三年(1595)之后汉中府辖区缩小后的各州县水利工程, 可知顾氏抄录的《汉中府志》应是万历以后编纂的《汉中府志》。又因顾炎武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 那么, 他可能见过两种版本的《汉中府志》: 一种即是万历《汉中府志》,

① 参见顺治《汉中府志》卷1《輿地志》, “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 第144册, 第66页。

② 参见顺治《汉中府志》卷1《輿地志》, “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 第144册, 第68、75页。

③ 参见顺治《汉中府志》卷1《輿地志》, “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 第144册, 第72页。

④ 参见顺治《汉中府志》卷1《輿地志》, “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 第144册, 第67页。

⑤ 参见顺治《汉中府志》卷2《建置志》, “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 第144册, 第169页。

⑥ 参见顺治《汉中府志》卷4《官守志》, “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 第144册, 第352页。

⑦ 顺治《汉中府志》卷4《官守志》, “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 第144册, 第516页。

⑧ 《明神宗实录》卷140“万历十一年八月壬子”,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962年, 第2603页。

⑨ 顾炎武撰, 谭其骧等校点: 《肇域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第2817页。

另一种则是冯达道编纂的顺治《汉中府志》。将顺治《汉中府志》卷3《食货志·水利》的内容与顾炎武抄录内容对读后发现，文字分毫不差，文字差异出现在评论文字部分。《天下郡国利病书》抄录的评论文字如下：

按筑堰溉田，为利最大，厥工亦最艰。岁出桩资，岁动夫力，苟能无法以变通之，则利源反为害丛矣。故议者谓筱囤之宜置也，柏筑之宜坚也，冲崩之宜稽也，堰长之宜择也。夫册宜清，桐口宜石，而灌序之宜定也。筱囤置则桩可省，筑坚则堤无溃，冲崩稽而补修有数，干没者何所作其奸？堰长择而后督率得人，规避者何所施其巧？夫册综以清，斯无偏苦之忧；桐口砌以石，斯无盗挖之弊；若上四下六之次序有定，则上坝下坝之分愿各得所称。水利者，信乎其为美利，而积于不涸之源，流于不竭之渊矣。^①

顺治《汉中府志》的评论内容如下：

水之为用大矣哉！汉中之水，非渠堰不为功，而桩资、夫力所费，亦不可胜计。昔人建议谓：筱囤置而后桩可省，柏筑坚而后堤不溃，时察冲崩而后修补有数，慎择堰长而后督率得人。夫册宜清，以防偏累之忧；桐口用石，以杜盗挖之弊；上四下六，灌序有定，纷争者亦喙息焉。详哉，其言之至！山河等堰为南、褒、汉卫所共利；城、洋二邑亦并用杨填之水。则所谓均丈尺以便修葺，立工保以任程督，委职官以防凌辄，因农隙以豫修筑者，亦既勤有成规矣。顾良法美制，合众人之智，百年谋之而不足，一人一日，败之而有余。亲吏之民相度可不勤管缮，可不先欤？萧曹截流东绕，始事之勋侔禹绩。已赵宋数百年，有事于堰者，前后非一，而工料材计，丈尺之数，简点之由，受委之姓氏，纤屑必表于碑。古人之意用告踵而行者，无变旧章，无隳前功，而因时规利，补畴昔所未逮，诚存乎其人云。达道识。^②

上述评论文字最末有“达道识”三字，可知出自冯达道之手。将两段评论内容对比之后就会发现，冯达道不但见过顾炎武抄录的《汉中府志》，而且将评论文字作了引述，标为“昔人建议谓”；掇拾前人观点之后，尤显意犹未尽，又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挥评论。既如此，顾炎武抄录的《汉中府志》、冯达道转述的《汉中府志》应当就是万历《汉中府志》无疑。

综上所述，顺治《汉中府志》大量使用万历《汉中府志》旧志雕版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也正是由于冯达道的“偷懒”，间接为我们保存了万历《汉中府志》基本面貌。

三 独特纂修办法：替换与增补

有了万历《汉中府志》雕版作为基础，冯达道便把修志重点转移到替换与增补两项工作中。替换工作主要是替换旧志《建置志》中“兵防”部分以及《食货志》中“田赋”部分。明代军事的主力是遍布全国的军事卫所，入清之后，八旗、绿营成为主角，前朝卫所纷纷予以裁撤。冯达道便在《建置志》“兵防”一节以清初驻扎汉中的军事部署情况替换前朝卫所武官、军丁的记载；并且记载汉中卫、宁羌卫、勉县守御千户所裁革卫所武官、将卫所军户改为屯丁的情

① 顾炎武撰，黄坤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35—2036页。

② 顺治《汉中府志》卷3《食货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313—314页。

况。田亩数额与土地质量是征收田赋的依据，人丁数量则是征发徭役的依据，在明代一条鞭法改革之后，田赋与徭役一并折银征收，地方志书都会详细记录本地田赋与徭役折银的情况。经过明末清初兵燹洗劫，田地荒芜、人口逃亡，汉中府赋役征解情况与明万历年间已发生较大变化，冯达道遂将旧志《食货志》“田赋”一节抽出，重新补入清顺治年间汉中府所辖州县及明朝遗留的汉中卫、宁羌卫、勉县守御千户所田赋及人丁徭役折银的内容，又云：“田赋之数据、现年规则，胪列如右，虽将来赢缩，间有不齐，此其大略也。考之旧志，盖田不加辟，且就芜焉，赋则渐倍他日矣。兵燹饥荒之后，无黔无皙，皆鸠鹄也。烟火不接，而犹勤正供，汉民其余古哉！”^①由此可断定，“田赋”数据均为清顺治年间重新调查所得，用以替换明朝万历年间田赋及人丁徭役折银之旧额。

相较于替换旧志内容，增补工作则是自万历三十一年始，至顺治十三年止，对明末清初五十余年间汉中府各方面文献进行增补。增补方式又可分为3种情况：

其一，直接增补。明万历《汉中府志》原无“藩镇”，清顺治年间平西王吴三桂率领大军镇守汉中，冯达道新编“藩镇”一节，将吴三桂为首的满汉官员员额、俸禄、驻军人数、禄米，甚至马匹草料均一一记录在案，列入卷2《建置志》。又有将增补文字直接刻在万历旧志雕版上，《建置志》“津梁”载“洋县为桥者七”一段，最后补刻“今知县曹可大于浣滨河筑桥利涉”14字。^②

其二，直接续补。将新增内容直接附在万历旧志各卷相关内容之后，如卷4《官守志》将万历三十一年之后陕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关南道、汉中府知府以及各州县官员题名附录于旧志职官题名之后；卷5《人物志》则在万历科举题名之后，增刻天启、崇祯及顺治年间举人题名。此类以年代为序的职官、科举题名增补起来较为容易，只需将后续题名刊刻印刷，再将书叶分别插入旧志相应位置即可。

但是有些部分的增补则较为困难，如卷2《建置志·城池》以汉中府城（南郑县）、褒城县、城固县、西乡县、凤县、勉县、宁羌州、略阳县为序，彼此之间前后相继，旧志雕版已无空隙，无法增补明万历之后各地城池情况。因此，不得不采用第三种办法，即集中续补之法，予以集中处理。冯达道遂以“续考”之名，总括汉中府、凤县、西乡县、勉县、略阳县、宁羌州、洋县七地城池的情况集中附在旧志“城池”之后。同卷“学校”部分也以“续考”之名增补府学、洋县学、略阳县学三地学校新内容。又如卷3《食货志》“灾祥”部分，冯达道又以“灾祥续考”之名编辑西乡县、洋县、勉县、宁羌州、略阳县五州县情况，附录于旧志“灾祥”之后。“续考”内容采取有则补之、无则不补的原则，只涉及汉中府所辖若干州县，而不包括所辖全部州县。

经过一番较为细致的排列组合、替换增补，冯达道最终完成顺治《汉中府志》纂修工作。卷1《舆地志》，含星野、沿革、疆域、山川、陵墓、风俗；卷2《建置志》，含城池、藩镇、兵防、公署、学校、津梁、秩祀、寺观；卷3《食货志》，含田赋、茶课、物产、水利、灾祥；卷4《官守志》，含官师、宦迹；卷5《人物志》，含科甲、名贤、侨寓、仙释、贞烈；卷6《艺文志》，含诗类、文类。最终形成以万历《汉中府志》为底本，以明末清初文献为重要补充，辅以冯达道评论文字为一体的顺治《汉中府志》。但因为旧志雕版书叶与新增替换书叶混杂在一志之中，文字字体无法统一，全书页码虽经剗改重编，但仍有未改、错改情况，因此全志总体上存在阅读不便、观感不美的遗憾。

① 顺治《汉中府志》卷3《食货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293页。

② 参见顺治《汉中府志》卷2《建置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238页。

四 明清易代视角下的文献价值与缺憾

清顺治《汉中府志》上承万历旧志、下启清代新志，又因其颇为独特的纂修过程，使得该志的文献价值独具特点，其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其一，保存了万历《汉中府志》基本面貌。明万历三十一年《汉中府志》成书之时，正是明朝后期汉中府行政区划调整之后，该志的记录是了解这一时段汉中诸方面状况的关键。但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万历《汉中府志》已散佚无存。通过对顺治《汉中府志》的考察，发现该书直接保存大量万历旧志的书叶，提供了明代后期汉中府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原始记录。尤为重要的是，嘉靖《汉中府志》未编《艺文志》，万历《汉中府志》新编《艺文志》大量收录明万历三十一年之前诗文，又为顺治《汉中府志》所继承，成为目前所能见到的汉中诗文总集的最早源头。顺治《汉中府志》省时省力的便宜之举，却在无意之间保存了万历《汉中府志》的基本面貌，这也是冯达道留给后人的意外惊喜。

其二，保存了明末清初的珍贵史料。明亡清兴之际，正是各方政治势力缠斗、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时期。明末战乱、清初兵防、前明卫所裁革、田赋征收、吴三桂驻守汉中等明末清初的汉中史实皆仅见顺治《汉中府志》记载。以吴三桂驻扎汉中事迹而言，顺治《汉中府志》纂修之时，吴三桂正手握重兵东征西讨，为清廷统一全国立下汗马功劳。因吴三桂长期驻兵汉中，《汉中府志》对其多有溢美之词，且在“藩镇”“兵防”详载其俸禄及军力部署情况。但“三藩之乱”发生之后，吴三桂成为清廷急欲诋毁的“乱臣贼子”，后世史籍对其事迹极力抹杀并加以丑化。康熙《汉南郡志》仅载康熙十三年（1674）至十八年间“滇逆”吴三桂部将蹂躏汉中所属州县事，不载顺治年间吴三桂驻扎汉中旧事。^①

又有史实散见于全志各处，如明末瑞王朱常浩建藩汉中之事，该志卷2《建置志·城池续考》载天启元年（1621）于汉中设瑞王府拓展汉中府城池，卷4《官守志》则载天启七年瑞王朱常浩就藩汉中途中，西乡县知县徐汝正因供帐不力，为瑞王扈从鞭扑羞辱，乃至溺水而亡，均始见该志记载。又如明末清初各方势力对汉中地区的争夺攻防战事，卷3《食货志·灾祥续考》载明末清初西乡县、洋县、勉县三县流寇掠城事，尤其对李自成部将韩文率兵攻打土寇胡向化，导致洋县五云宫被焚的经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卷4《官守志》关南道副使胡全才传记载胡全才与李自成部将贺珍争夺汉中的战事情况。冯达道纂修《汉中府志》正处于明清之际，文网尚不严密，纂修志书尚无顾虑，这为后人追寻明末清初汉中社会的真实状况提供了珍贵史料。

其三，冯达道的精彩点评。冯达道生长在社会经济繁荣的江南，因此在志书中常将汉中与江南相比。他在《輿地志·沿革》点评汉中所辖州县规模时说：“今日之汉，编户不过百余里，盖江南一小县耳。剖而为九，其有几何？不得已而差次之，洋也、城固也，西乡、南郑也，伯仲之间也。宁羌、略阳，郤以下无讥焉。而况勉之芜陋也，不过一村落后。褒邑之冲疲也，空城荡荡，阒无居人。凤之饶瘠也，万山中一亭长，有白石可煮耳。”^②直言汉中战乱之后城池荒芜的破败景象。而这样破败的景象又与汉中少土著、多移民的人口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德则来思，怨则去汝；安则土著，危则流庸。”^③ 社会生活流民化进一步加剧了本地宗族权势薄弱、百姓好信巫蛊的社会状况。“家号荐绅，人非草莽，乃或谱牒无稽，致宗支之杂糅，寝庙不立，悲祭奠之踉

① 参见滕天绶修，和盐鼎纂：康熙《汉南郡志》卷2《輿地志·僭乱》，清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② 顺治《汉中府志》卷1《輿地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77—78页。

③ 顺治《汉中府志》卷1《輿地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90页。

跽，其与穷乡僻里之民懵于七夕、中秋之节者，相去不能以咫”，“尤有异者，疾病不求草木之滋，而师巫用事；死丧则狃堪輿之说，而窀穸无期。竞锥刀之末，则告讦起于亲朋；逞睚眦之仇，而性命委诸沟渎”^①。因此，冯达道认为应当重视祠祀的教化作用，对汉中名宦乡贤祠祀荒芜甚为惋惜，“甚有数椽之屋，废而为墟，乡先生不得与社公争酒食，斯可叹也！”^②祠祀荒废的面貌与名宦乡贤祠宇众多、有“大家香火之讥”的江南，亦形成鲜明对比，冯达道希望尽快恢复本地祀典自然有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尊崇封建礼教的用意。

冯达道对明清之际的政治变迁亦有点评，针对清初裁撤卫所，冯氏即指出：“前朝卫所之设，始未尝不资其捍御，迄其终也，纨绔因仍，而戎籍不可稽，军实不可数。纵有存焉，金鸡玉犬，曾无鸣吠之实。”^③冯达道身为地方主政官员，对于普通百姓有着深切的同情。他辛辣地讽刺那些酷吏“特不为鸾凤，并鹰鹞不若也，直为攫肉之鸟而已，持论则喙长三尺，判事则手重五斤”^④，以欺压百姓为能事。他又于《人物志·贞烈》论及得到旌表、奖以衣食的贞节烈妇大多是具有社会地位的女性，而“委巷单门”中贫苦节妇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褒奖，“知之者耕田牧豎，两两三三，又无气力以致之当事，则亦与烟草同沦而已矣。人间荼苦，百萃于砥节之妇人，而幽光不扬，沉闭泉壑，如掾孰秉，通旁无繇”，冯达道“所为感怆盈中，掷笔而洒无从之涕”^⑤，对于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女性亦抱有深切同情。

冯达道之所以能够较为准确地加以品评，一方面是由于顺治《汉中府志》大量使用万历旧志书叶，冯达道能够站在旁观者角度对旧志内容、编纂得失进行客观分析；另一方面也与冯达道为人机敏干练，能够抓住关键问题的为政能力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冯达道的评论不但是顺治《汉中府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更为突出的文献价值。

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顺治《汉中府志》成书过程极其仓促，因而留有不少错误与缺憾，在保存万历旧志文献的同时，也沿袭了旧志中不少错误。试举一例，志书在介绍汉中府沿革时称：“在唐虞为雍州之域。《禹贡》，梁州。周，梁、雍地，曰褒、曰南郑。春秋属秦、楚。”^⑥汉中在春秋战国时的归属存在古籍记载有误、后世理解不一的情况。因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有“六国时，楚强盛，略有其地，后为秦，恒成争地”之说^⑦，《水经注》卷27《沔水》又载：“周显王之世，蜀有褒汉之地，至六国，楚人兼之。怀王衰弱，秦略取焉。”^⑧明清两代之《汉中府志》及相关县志，大多都有汉中之地在春秋或战国之时曾属于楚国的记载。其实，《华阳国志》和《水经注》中的记述，缘于对《史记》卷5《秦本纪》中“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⑨，以及卷40《楚世家》所载楚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遂取汉中之郡”^⑩，诸史料的误读。《史记》所谓的楚国汉中，

① 顺治《汉中府志》卷1《輿地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146页。

② 顺治《汉中府志》卷2《建置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265—266页。

③ 顺治《汉中府志》卷2《建置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194页。

④ 顺治《汉中府志》卷4《官守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523页。

⑤ 顺治《汉中府志》卷5《人物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5册，第119页。

⑥ 顺治《汉中府志》卷1《輿地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63页。

⑦ 参见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2《汉中志》，巴蜀书社，1984年，第107页。

⑧ 酈道元，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27《沔水》，中华书局，2007年，第645页。

⑨ 《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02页。

⑩ 《史记》卷40《楚世家》，第1724页。

地望为今陕西省柞水县乾佑河流域以东至湖北房县、丹江口之地，与汉代以后的汉中无关。^① 顺治《汉中府志》因袭旧说，致成错谬。

冯达道直接利用万历旧志雕版翻印新志、以替换增补的方式将明清之际的史事融入其中，完全是为了在短期之内快速完成顺治《汉中府志》的编纂工作。急于求成的做法并不是什么值得提倡的先进经验，而是一时之间的权宜之计。翻印拼合而成的“新志”存在文献体例破碎、内容杂糅的弊病与缺陷，“城池”“学校”“灾祥”一分为二。尤其是《艺文志》完全照搬万历旧志，全无新篇。冯达道对此亦有清晰的认识，针对《艺文志》所收诗文截至万历三十一年，此后文献缺失的情况，冯达道评论道：“惜旧志所载，诗若文容，佚于荟撮之外。而自万历中年，迄今五六十载，作者相仍，蒸云澍雨，欲广罗以志盛，念非时日所可了。姑仍旧本，订其讹谬，以成书。倘不至奉职无状，以速官谤，尚当遍采幽遐，别立义例，如曹能始《蜀中名胜》、刘同人《帝京景物》等编，以山水为经，诗文为纬，勒为定本。”^② 可知冯达道并非不想推倒旧志、重订体例、再编新志，但奈何“念非时日所可了”，只能一仍其旧，期待日后再有所作为。但随着冯氏的卸任，重修府志之事遂不了了之，直至清康熙三十年汉中府知府滕天绶新修《汉南郡志》才有新编《艺文志》问世。这期间近九十年的文献缺失之过虽不能完全记在冯达道名下，但却与其沿袭旧志、未对艺文志进行增补关系巨大。

五 顺治《汉中府志》的流传与著录

顺治《汉中府志》虽由冯达道修成，但顺治十三年之后仍有个别职官任职记录。如康熙四年（1665）郭永祚由本府通判升任知府^③；又如“高世豪，山东济南府淄川县人。由己亥进士。康熙六年任”南郑县知县。^④ 可知今所见顺治《汉中府志》又是由康熙初年汉中府、南郑县地方官员对零星书叶补刻重印而成。

自顺治《汉中府志》之后，又有汉中府知府滕天绶纂修康熙《汉南郡志》、知府严如煜纂修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后两部志书均将冯达道顺治《重修汉中志序》列在志书卷首，以示清代汉中府方志的纂修渊源。这也使得后世学者知道清顺治时曾有一部《汉中府志》，但大多只知其名，未知其详，对于顺治《汉中府志》的编纂体例、文献价值更是知之甚少。这一状况与顺治《汉中府志》传世数量稀少密切相关。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康熙帝“命纂修《一统志》”^⑤。《大清一统志》是全国总志，必然需要各地志书、舆图作为文献基础，全国各地都须向京师提供、报送各地方志文献，汉中府也同样如此，但此时顺治《汉中府志》已难觅全本。在汉中府知府滕天绶呈送的、名为“汉中府为志书遗佚请明示以便修辑以垂永久事”的公文中称：“今《国朝统志》现在修纂，下迨各省府县志书无不具备，独汉中自变乱之后，庐舍荡然，不惟旧志之刻板无存，即求有印本完全、足以备一时之观览者，去岁遵奉部文查取《汉志》，卑府于郡城内外远近绅士之家一一购求，仅得断简残编，合数姓之藏不能成一完本。卑府几经访求，方

① 按：汉中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归属问题参见严耕望《楚置汉中郡地望考略》一文（《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88—493页）。

② 顺治《汉中府志》卷5《人物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5册，第446页。

③ 参见顺治《汉中府志》卷4《官守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364页。

④ 参见顺治《汉中府志》卷4《官守志》，“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144册，第396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125“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己未”，《清实录》，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清内府钞本，第5册，第324页。

始装订成集。”^①滕天绶所说的“汉中变乱”是指三藩之乱时吴三桂部将盘踞汉中、荼毒百姓之乱局。据滕天绶所述,在这场变乱之中,明万历旧志雕版及顺治时补刻雕版全部付之一炬。滕天绶奉命寻找顺治《汉中府志》,虽几经拼凑,仍无全帙,最终不得不将残本凑补装订,应付交差。

目前所知,顺治《汉中府志》仅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藏,堪称世间孤本。全志分为6册:卷首与卷1《舆地志》合为第1册,卷2《建置志》与卷3《食货志》合为第2册,卷4《官守志》为第3册,卷5《人物志》为第4册,卷6《艺文志》分为两册,《诗类》为第5册,《文类》为第6册。各册首叶与末叶均钤有“京师图书馆藏书记”篆书朱文长方印,据考证该印章是民国初年京师图书馆使用的藏书印章。^②由此推测,顺治《汉中府志》原为清宫旧藏图书的可能性较大,极有可能就是康熙年间滕天绶几经寻访呈送京师的旧志。今所见第6册末叶是冯达道对《艺文志》“文类”的评论,但评论文字下文缺失,而“京师图书馆藏书记”印章正钤于此叶,可知最迟至民国初年时,顺治《汉中府志》已残缺。

顺治《汉中府志》初见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③,1985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亦著录。^④1987年,北京图书馆所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首次著录顺治《汉中府志》版本信息:“顺治《汉中府志》六卷。清冯达道纂修。清顺治刻本。六册。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⑤但对于顺治《汉中府志》存在的万历旧志雕版重印书叶与顺治增刻雕版新印书叶之间的版式差别,著录信息未作细致区分,一律指为清顺治刻本。

综上所述,顺治《汉中府志》作为孤本方志固然有其珍贵版本价值。但因该志对旧志雕版的再次利用,使得万历《汉中府志》名亡而实存;又因其对明末清初史实的真实记录与精彩点评,而具有时代特征清晰、文献价值深厚的突出特征。但为求快速修成志书,替换拼合而成的志书又存在文献体例破碎、内容杂糅的缺憾,并不能完全反映清朝初年汉中的全貌。但全面考察顺治《汉中府志》的纂修过程、文献价值与缺憾,对于后人理解明清易代之际地方史志的纂修方式与书写原则具有样板性的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康熙《汉南郡志》卷首《批详》,清康熙三十年刻本。

② 参见马谊:《国家图书馆各历史时期印章考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12期。

③ 参见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1958年增订本,第58页。

④ 参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198页。

⑤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655页。